

生育率的下降与亲属关系

周 云

【提要】 中国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会对社会的亲属制度和亲属称谓产生影响。首先是亲属数量的减少;其次,亲属数量的减少将会影响到一个人还有什么样的亲戚。亲属数量和类型的变化必将导致亲属称谓制度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作者】 周云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讲师。

1. 问题及意义

7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政策从“晚、稀、少”逐步转变,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一政策的实行尽管目前在农村还有一定难度,但在城市,由于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社会制约的变化,以及各级政府的一些措施,个人的生育观念和习惯都已有了重大变化,生育率已大大下降^①。由于流动人口的增加带来的文化传播,特别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理性化倾向对农村和内地的渗透,可以预见,这些地方的生育率也会随之下降^②。然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将对中国的整个群体的亲属关系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对中国的社会有什么影响?本文将从这一角度作一初步分析。

2. 中国传统亲属关系及亲属称谓制度

从社会学角度看,后裔并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延续的保证,更是劳动力的来源,是建立牢固社会网络的基础,当然也是养老的资本。由于这种经济的社会的功能,因此在农耕社会中,从家庭中就产生出支撑这种社会经济功能、并与之同构的生育文化。因此长期农耕社会的中国形成了崇尚大家庭的传统,每个家庭、家族都以人丁兴旺、人口众多为荣,人口繁殖较快。而人口的增加也使亲属数量增加,并形成了亲属称谓制度;反之这种制度,细致地分辨亲属关系并配以相应的“权利”、“义务”^③。因此中国传统亲属关系既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也

* 本文是根据本人在“第二次生育下降中的新人口问题研讨会(1995年10月)”的论文修改而成,特此说明。同时,本论文的写作得到世川良一研究基金的赞助,在此致谢。

① 如,1973年的出生率为27.9%,80年为18.2%,93年为18.1%(《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4,北京:《中国计划生育年鉴》编辑部)。

② 韦伯(Max Weber)认为,市场经济是理性化的经济,这种理性化倾向将影响人们的各种行为和各种制度,并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的理性化;参见,Max Weber, *On Law in Society and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在人口理论中,关于生育率下降是理性选择的观点最为典型地体现在贝克尔的生育研究上,参见,加利·贝克尔(Gary S. Becker),《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中译本,第9章。

③ 家庭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的是一个人口规模小的家庭,如包括夫妻及其子女两代人的核心家庭。而广义的家庭可以包括由众多亲属组成的人口规模大的家庭。一个社会对亲属系统的认同决定着广义家庭的范围。整个亲属系统又是建立在社会和文化认同的由血缘或姻缘产生出的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关系上的。它对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及一个社会团体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作用。通常用一些特定的名称来称呼这些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

是强化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因素。

中国汉民族重视未出五服的父系亲属,亲属称谓相当复杂^①,分类的基准是辈分与年龄。且不提全部五服内的亲属,只考虑以一个人作为基点的上下四辈的父系亲属——祖父母辈、父母辈、本辈、同下一辈——的称谓就足以证明其复杂性。以第三辈(既本辈)为基点只叙述父系亲属,第一辈:爷爷、奶奶,大爷爷、二爷爷……大奶奶、二奶奶(大爷爷、二爷爷的妻子,姻亲),姑奶奶、姑爷爷(姑奶奶的丈夫,姻亲)。第二辈:父母,叔伯姑。第三辈(本辈):兄弟姐妹。第四辈:侄子侄女(兄弟姐妹间对兄弟的子女,或者说是这些人中同姓的下一辈人的总称),外甥外甥女(兄弟姐妹之间对姐妹的子女,或者是对这些人中异姓的下一辈人的总称)。注意,这仅仅是一个人以他(她)所处的第三辈的立场看待上下四辈人的称呼的。若再叙述母系方面的亲属,就会出现一整套与父系亲属称谓完全不同但基本相对应的称谓。因此,可以说中国汉人的亲属称谓制度是有很严格的分类的,这些复杂称谓的基础之一是有众多亲属的存在。

3. 对个人亲属的影响

然而,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生育率的下降,这种昔日的亲属制度和亲属称谓制度将发生激烈的变化。

首先是亲属数量的减少,这包括同辈亲属以及上下几辈亲属等。人口的减少在家庭层次上的表现是各类亲属的减少。当一个人没有太多的兄弟姐妹时也就意味着对他(她)下一辈人来说父母辈亲属的减少,继而对再下一辈人则是祖父母辈人的减少。显然,在今后几十年内将可观察到。

其次,亲属数量的减少将会影响到一个人有什么类型的亲属。以前中国大家庭注重血亲亲属^②,但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的推广将使家庭中亲属之间的关系更多为姻亲关系。理由是一个除父母、子或女外,他(她)没有任何其他血亲亲属,和他(她)有关系的亲属是通过婚姻联系的姻亲。例如一个男子是通过与一位女子结婚才有了或者说只能有依靠女性的姻亲亲属。同样,一个已婚女子只有丈夫带来的姻亲,由于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种姻亲永远只限于一个人配偶的父母辈亲属(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而不可能有通过一个人的兄弟姐妹的配偶连接的亲属(如通过嫂子、弟妹、妹夫等类人带来的姻亲)。同时一个家庭唯一的一个孩子的性别非男即女,这就出现了家庭内原已是靠婚姻联系的亲属只能是通过一种性别联系的亲属,而不可能是通过男女双方的。对一群人来说由于每代人的孩子性别是摆动的(非男即女),这种姻亲关系也不是固定在一性别上的。这是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时亲属类型的变化。

目前在汉民族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强调只生一个孩子,但在实施时因地制宜。

①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人类社会中有大约六种不同的亲属称谓制度:克劳、爱斯基摩、夏威夷、易洛魁、奥马哈、苏丹亲属称谓制。在这六种称谓制中苏丹称谓制将各类亲属区别得最为细致,每个亲属都有与其他亲属不同的称谓。中国汉族亲属称谓属苏丹称谓制。参见, Schultz, Emily and Robert H. Lavenda, 1987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condition*, San Francisco: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pp.189~199.

② 血亲是指凡有直系或旁系的血统的亲属;而姻亲则指这类亲属:血亲的配偶、配偶的血亲、血亲的配偶的血亲、配偶的血亲的配偶等由婚姻所产生的亲属;见陈颂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205页。

许多地区有这样的政策，即当一对夫妇的第一胎是女孩时，他们可以在几年后（要有一定的间隔年限）再生一个孩子，但这必须是最后一个孩子。如果第一胎是一个男孩，年轻夫妇就不允许再生了，不可以有两个（包括两个）以上的子女^①。这是部分农村地区考虑到农村的现实（需要有男劳动力）制定的区域计划生育政策。对第四次人口普查山东省10%数据的分析发现，全省有1979年后出生的、1990年普查时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第二个子女户数占全省总户数的17.85%。其中城市中有第二胎的户数只占城市户数的0.41%，而农村占19.16%。可以说山东省的二胎现象不很普遍，尤其在城市里。但分析二胎与第一胎性别关系时发现，1979~1990年间多数年份第一胎为女孩的第二胎的百分比高于第一胎是男孩的第二胎的百分比。或者说山东省在1990年普查时两个孩子的家庭虽少，但其中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多（见表1）。根据这种现象可以分析一下只生一孩或者因第一胎是女孩而可以生二胎（以下简称“有限制的二胎”）的生育行为对亲属关系的影响（见表2）。

表1 山东省第一胎是女孩的两胎生育数在两胎生育总数中所占的比重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全省	43.27	50.50	53.39	52.44	50.70	48.12
城市	48.57	51.23	54.35	52.11	55.00	50.00
农村	42.82	50.51	53.35	52.40	50.57	48.39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全省	48.27	52.71	55.90	53.67	54.16	57.99
城市	53.09	61.94	62.69	55.91	58.89	41.38
农村	47.98	53.01	56.49	53.89	54.36	59.19

资料来源：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山东省10%数据资料计算。计算得到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刘鸿雁同学的帮助，在此致谢。

表2 一胎和有限制二胎的生育与亲属关系

子女的数目、性别及其子女之间的关系	子女一代人与其下一代人的亲属关系	
(严格一胎的人群中)		
男	—	—
女	—	—
(有限制的二胎)		
女(姐), 男(弟)	舅, 姑	侄子(女), 外甥(女)
女(姐), 女(妹)	姨, 姨	外甥(女)

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没有考虑父、母、祖父母辈的亲属。其中姐弟或姐妹的关系指的是按表2中所举的孩次和性别的顺序时的亲属关系；舅、姑以及侄子或外甥等的关系是按照是上一辈亲属的顺序及性别而推出的亲属关系。例如我父亲有一个姐姐（“有限制的二胎”的情况下），对我来说她是我的姑姑，我是她的侄子（女）；站在我姑姑的孩子的角度来看，我的父亲（这个孩子的母亲的弟弟）是他（或她）的舅舅，他（或她）是我父亲的外甥（女）。表2可以说明独生子女的后代除其父母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父母辈的亲属，在有限制的二胎的人群中，人们不可能有叔伯这类男性亲属，只可能有舅舅这种男性亲属。或者说父系亲属中只能有姑姑这种女性亲属，母系亲属中可以有舅或者姨这两种性别的亲属。如果按照汉族注重区分父母系亲属的习惯来看，舅舅属于母系男性亲属。父系亲属中没有男性亲属，只有姑姑这种女性亲属，父系亲属种类单一是——胎和有限制的二胎生育行为的结果。

由于亲属数量和类型的变化必将导致亲属称谓制度的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亲属称谓中将没有序列之分，如大哥二姐、三舅大伯之称。以往最常使用的同辈称谓“哥、弟、姐、妹”称谓词的使用频率也将会大大减少。即使使用时，有些称谓也会失去其原有的血缘

由于亲属数量和类型的变化必将导致亲属称谓制度的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亲属称谓中将没有序列之分，如大哥二姐、三舅大伯之称。以往最常使用的同辈称谓“哥、弟、姐、妹”称谓词的使用频率也将会大大减少。即使使用时，有些称谓也会失去其原有的血缘

①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72、181页；Tu Ping, 1995 “IUD discontinuation Patterns and Correlates in Four Counties in North China”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vol.26, no.3: 170.

及序列意义。特别是在许多孩子心目中,所谓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只是大人们让他(她)在称呼其他不同年龄孩子时的词语,使用这些词的准则完全建立在年龄大小的基础上,而完全没有亲属意义。称一个女孩为姐姐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同父同母的手足,仅仅是因为这个女孩比我大一些,称其为姐姐只表示我对她的尊敬。这种情况在城市地区的儿童中已经极为普遍。如果一孩人口政策长期实行,父母辈亲属称谓“叔伯姑姨舅”,祖父母、外祖父母辈的亲属称谓“几爷爷奶奶,几姥姥姥爷”(不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称谓,因为只要一个人有父母,这几种称谓就存在)在两三代人之间就会消失。人们将没有机会使用先前流传下来许多的亲属称谓,而只会经常使用一种或几种这类称谓词。很多称谓词语将可能会成为历史,只有在小说或者研究亲属关系的著作中出现。

4. 对社会的影响

尽管生育率的下降使人们在社会中血缘联系减少了,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的强调,人们对小家庭有可能更为关注。虽然三代同堂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三代之间的血缘关系可能会增强和巩固^①。人们可有的亲属已经不是很多,现有亲属之间的感情可能会更深一些,因为他们相互间的情感或其他依赖性都将增大。这对老年人的养老可能会有一定正面的影响。这里面可能由于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事实上只有独生或双生子女,易于从小形成了一种对父母责无旁贷的观念。当然也会因为子女数目过少,老年人得不到以往有多子女时的照顾。孩子多时,每个孩子拿出一点时间和孝心就可以使老人在精神和身体健康上得到满足,而现在由于核心家庭或工作忙碌,社会养老或者依靠雇佣外人帮助照顾老人的情况将会大大增加。从这两方面来看,可以说三代人的亲属关系更为紧密,但传统的养老或照顾老人的方式会有所变化。

另外,亲属关系的变化很可能引起“女婿”在中国社会地位中的变化。以往中国社会更看重父系亲属,这点从家谱的记录上可以看出。在家谱里如果记录女性的话,出现在其中的女性也多只限于女儿、媳妇、孙女,女婿、外孙女等与女性有关的亲属往往不出现在其中。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减少,特别是在家庭层次上人口的减少,我们可以期待着人们对母系亲属态度的转变。倘若继续写家谱,家谱中记录的亲属会扩展至一定程度的母系亲属。经过一段时间,中国的父系社会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向较松散或平等的亲属制度过渡。其实这种变化在许多发展较快的大都市里已有所体现^②。由于子女的数目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紧密相联,城市出现了许多独女户,而在农村也会出现一部分只有女儿的家庭。女婿这个以前不很显赫的亲属地位将会提高,这将是亲属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上面提到养老问题,以往人们是依靠儿子养老。但仔细分析一下在儿子家里实际上多靠儿媳(一位女子)来照顾老人。对女子一生工作的传统观念是生儿育女、管理家务、照看老人。女子照顾老人的原因有许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其特有的爱心、耐心和细心。现在儿子和女儿(或者说男女)的地位在向平等的方向发展,当人们意识到女子在照顾老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时,就更不会特别强调儿子养老。

① 以前当一个祖父母有十几个孙子孙女时,他们不可能给所有这些孩子以足够的关心和照顾。现在只有一个第三代(孙子辈)的小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尽可能地各方面照顾他(她)。

② 据徐安琪1993年在上海市的调查,丈夫与其父母的交往频率低于妻子与其父母的交往频率,丈夫与岳父母的联系密度也高于妻子与公婆的联系密度,丈夫与不同居住的兄弟姐妹互动频率略低于妻子,家庭与不同居住儿子的联系也略低于女儿。“城市家庭网向女方亲属倾斜”,《婚姻与家庭》,1995年第6期:48~49。

此外,亲属数量的减少会减少社会中人们对亲属关系的依赖,从而对社会组织甚至生产方式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以往在农耕收割时亲属间互相换工帮助^①,现在随着亲属数量的减少(生育水平下降是主要原因,人口流动是另外一个因素),一些农村地区在农忙时必须请外人帮助干活。这种变化将使亲缘关系大大松弛,由于需要,以及市场经济观念的渗入,建立在契约基础上互惠交易关系将日益普遍。

5. 分析和结论

综上所述,生育率的下降对一个人口的亲属关系、相应的称谓结构,以及社会结构都正在或可能产生影响。本文仅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而事实上,亲属关系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能比上述变化或可预见的变化更为深刻和久远。由于亲属关系的简单化,在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这一变化将大大有助于^②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中国社会中宗法文化的淡化,从而形成一种更为个人化、契约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即使是称谓的变化,可能也并非只是一些词语丧失活力。根据萨皮尔(Leslie Spier)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研究,语言上的这类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和结构,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③。果真如此,那么亲属称谓制度的变更就决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而可能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社会大变革。至于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将更为直接地影响人们的观念。例如,女婿社会地位的提高就可能对农民在生育性别偏好上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些变化及其久远的后果都将花费时间,但这些变化将是深刻的,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实证和理论研究。

(本文责任编辑:朱 萍)

中国人事出版社隆重推出 大型优秀人才系列辞书

为了充分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中国人事出版社将隆重推出优秀专业人才大型系列辞书。这套辞书将收入自中国正式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以来工作在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才。资料翔实、收录齐全。辞书既是人才库,可以为人才、科技、学术信息提供详细资料,又有收藏价值。首批编辑出版的三套辞书为:《中国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编辑名典》、《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中国中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现正向各界征稿(详细情况请参阅1995年5月11日、18日《光明日报》)。已具备入典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请向北京市宣武区里仁街宏建南里2号中国人事出版社人才辞书编委会索要入典表格。邮编:100054 电话:(010)3523062

① 王铭铭1991年在福建省安溪县下属的溪村进行调查时发现当地86%的社会互助资源来自亲属,只有14%来自朋友和其它关系。在这86%中45%是“堂亲”(由同一祖厅分化并追述到同一祖公的家庭群体),41%为姻亲。

“溪村汉人的家庭社区与文化”,《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1995年第13期:6~11。

② 这里说“有助于”并不隐含作者认为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转型是可欲的,这里仅仅是一种预测。

③ Cf. Benjamin Lee Whorf, *Language, Thoughts & Reality*, The MIT Press, 1956.